

厦 门 大 学 海 外 教 育 学 院
海 外 華 文 教 育 研 究 系 列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对外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

(中日双语版)

王 虹/著



ZHONGRI BIJIAO WENXUE
YANJIU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王 虹 / 著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中日双语版)

对外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王虹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7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系列)

ISBN 978-7-5615-2831-0

I. 中… II. 王…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日本 IV. I206
I313.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276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肩负着向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当前的世界格局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应用价值也不断提高。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现在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汉语和汉语人才。

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呼唤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为其提供系统、科学、富有生机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从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编写出适合海外学生的富有特色的汉语与中华文化教材。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作为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在近半个世纪的海外中文远程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特组织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编写了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丛书”和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系列教材”。研究丛书力求以宽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考,努力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的问题;系列教材力求较为系统地介绍海外学生应该掌握和了解的汉语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实用性强。

我们衷心希望研究丛书和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事业添上一砖一瓦,同时也希望有关专家、学者以及使用者、学习者都能不吝赐教,以期将来进一步修改提高。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序

1784 年 4 月 12 日在日本福冈县东区志贺岛叶崎出土发现了刻有“汉委奴国王”文字的金印（目前藏于富冈市博物馆）。其中的“委”字，按字源考证为“倭”字的篆体文字。根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 1 世纪日本称为“倭”。再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奴国王曾于公元 57 年派使臣到洛阳朝贡，东汉光武帝赐金印给倭奴国王。为此，这枚金印便成为后人推断汉字传入日本的标志。此后又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在鹿儿岛种子岛广田遗迹出土了刻有“山”字的贝片，据称是日本弥生中期（约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的物品；在三重县安浓町大城遗迹出土了刻有“奉”和“年”字的陶片，据称是 2 世纪初的物品；同时在该县嬉野町片部遗迹出土了写有“田”字的墨迹陶器，据称是 4 世纪的物品。更令人惊奇的是，1998 年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田和山遗迹出土了两块带有墨迹的砚台断片，据考古专家认为该砚台是中国前汉时期（公元前 202—公元 8 年）设于朝鲜半岛的乐浪郡（今平壤附近）生产的。尽管没有在该遗迹发现有关文字，但是对研究汉字传播途径却具有较高的价值，也是日本到目前为止有关文字传播的最原始的重要资料，它给我们断定汉字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传入日本提供了较为确凿的证据。

据历史记载，公元 478 年倭武王就能用很熟悉的汉字给中国南北朝的宋国皇帝写奏文，说明 5 世纪时日本朝廷已经能够开始

正确使用汉字了。^①虽然后有遣隋遣唐使、日本圣德太子用汉文所著《三经义疏》被携入中国^②，又有鉴真东渡、空海来唐等两国友好使节僧侣的往返穿梭，但是当时的汉文、汉诗都是被作为一种高深的学问或修养在日本朝廷及寺院传播的，日本正式实施汉语教学是在 1871 年 2 月日本外务省开设“汉语学所”以后。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清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中文翻译。明治初期日本讲授的是南京语，当时被称为汉语。

明治 6 年（1873），“汉语学所”脱离外务省由文部省管辖，不久随着东京外国语学校建立，成为该校的汉语科，教师、学生、教学方法以及翻译的教学宗旨都未发生变化，一直延续到明治 9 年（1876）7 月，同年 9 月以后才开始转为北京官话教育。^③

1885 年随着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出现，汉语教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教育界对外语教学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欧美语言被认为是上等语言，亚洲语言被视为低等语言，汉语被作为“军队支那语”，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工具。1945 年日本战败，旧的汉语教学宣告结束。正如日本学者六角恒广指出的那样：“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汉语教学以昭和 20 年（1945）战败为分界线，其前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④前者是以会话实用为目的，后者则是以学习中国文化为目的。

1946 年 10 月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主持成立了中国语学研究会（目前的中国语学会），汇集了日本的汉语学者和教师，

① 杨考臣等编：《中日关系史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② 王勇：《中日关系史论考》，《〈三经义疏〉在东亚的流播》，中华书局 2001 年 7 月版。

③ [日]六角恒广：《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东方书店 1988 年 7 月版。

④ [日]六角恒广：《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东方书店 1994 年版。

探讨了今后汉语教学的发展道路。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开设汉语课的大学逐年增多，汉语被视为与欧美语言同等的一门外语，被正式列入大学的外语教学科目。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也连年递增，中国语学会制定了本国的“中国语检定试验”即日本的汉语水平考试标准并付诸实施。至此，汉语教学在日本才开始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目前日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总数为 649 所（不包括短期大学），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和设有中文学科、中文专业的学校加在一起占 649 所大学总数的 95% 以上，可以说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中文课。

在日本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本国以日本留学生为对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虽然教学地点不同，但其性质并无大的差异。正因为地点不同，其社会气息、文化氛围，经常会对师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所谓正面的影响是指社会气息与文化氛围对汉语学习的促进作用，负面影响指的是这些气息与氛围对汉语学习带来的干扰和阻碍。由于存在这种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就要求教师学会排除干扰和阻碍，并有效地因势利导顺利地开展教学，使学生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学好汉语。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鉴别，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比较研究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深对语言及社会本质的认识。因此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就离不开比较研究，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结合课堂内容，通过具体事例带领学生分析比较，就可以使他们较快地认识异国的语言及社会背景，对两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有着较深或较为明确的分辨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汉语教学方向是了解中国的文化，既然如此就要在对日汉语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举一个在日本最引人轰动的例子，1988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设宴款待江主席一行。当时江主席身着中山

装参加宴会，日本媒体及各界大概是联想到针对历史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严肃立场，上下一片哗然，理解程度各不相同。当时我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电视台正准备播出这条新闻，有些日本同事也不理解这一点。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中国籍的播音主持从中山服的由来到它的历史文化，从文学作品当中的描述到现实生活中中山装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比较说明和耐心讲解。在日本研究生院的课堂上，我也把这一问题作为比较研究的一项内容指导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使他们加深了认识，转变了看法。这件事说明，即使懂得语言，但不懂得文化仍然会出现误解。所以语言教学不能与文化、习俗等语言背景教学脱节，否则对方国家和学习者难以接受，甚至会造成难以置信的不良后果。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最为常见和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双方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文学当中包括语言，也包括特定的历史、社会状况，同时它还涵盖一国的风土民情和人的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决不能忽略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并要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

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各国文学发展、交流影响的基础上产生的。比较文学不仅是对作家或作品的跨越国界的影响或接受情况以及阐述某种文学现象的外来渊源的研究，也是打破以往狭隘的民族、区域局限，打开文学研究的眼界，在世界文化史的广阔时空领域里对跨国度或跨学科的文学关系和文学规律的研究。^①所以，比较文学研究绝非单纯的作品比较，而是在这一比较中加深对两国历史、社会、人性和人的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细致综合地分析和比较，从而明确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到如何理解和接受的妥善方法。日本十分重视

① 《百科全书》，文学词典，学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比较研究，日本的腾飞和发展也与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本书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世、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生课程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研究生和赴日考研的学生，还可供中日两国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进行参考。但愿它能够使更多的日本学者和本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产生兴趣，在学习研究汉语的过程中能够探讨比较文学问题和如何把对外汉语与比较研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把对日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的阵容，提高对外汉语和本国日语教学的质量，开拓学生视野，使我国的对日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朝着高水平方向永久持续性地向前发展。

作者

目 录

(中文部分)

总序

序	1
《杜子春》再考	1
《杜子春》的幕后	14
一、《杜子春》问世的社会和其作品描写的世界 (14)	
二、芥川龙之介与牛僧孺 (21)	
《蜜柑》与《一件小事》比较试论	28
一、前言 (28)	
二、发生于“冬天”的小事 (30)	
三、文体上的异同 (33)	
四、“私”与“我”的异同 (38)	
五、结语 (42)	
反映在《河童》中的《狂人日记》	44
一、“狂人”的出现 (44)	
二、关于两部作品的序 (47)	
三、《河童》中《狂人日记》的缩影 (53)	
“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作家	
——关于芥川·鲁迅·郭沫若	60

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

——抒情的文学·····85

一、何谓“抒情”（85）

二、“情感”与“现实”（88）

三、描写与“真实”（96）

四、风格与艺术（101）

《日本漫游 外人膝栗毛》讽刺小说论·····103

一、《外人膝栗毛》概观（104）

二、与鲁文的《万国航海 西洋道中膝栗毛》的类似点（110）

三、《日本漫游 外人膝栗毛》的特色（118）

四、讽刺小说的历史演变（120）

五、结论（121）

鲁迅的翻译活动及其时代特征·····122

一、前言（122）

二、鲁迅的日本文学译著（123）

三、鲁迅翻译日本文学的时代（126）

四、鲁迅文学活动的开始（130）

五、结语（136）

后记 ·····137

目 次

(日文部分)

序言	143
『杜子春』再考	148
『杜子春』の背後	163
一、『杜子春』誕生の社会とその社会に生まれた作品の世界 (163)	
二、芥川龍之介と牛僧孺 (171)	
『蜜柑』と『一件小事』の比較試論	178
一、はじめに (178)	
二、「冬」に発生した出来事 (180)	
三、文体上における異同 (183)	
四、「私」と「我」における異同 (189)	
五、おわりに (193)	
『河童』に映された『狂人日記』の縮図	195
一、「狂人」の誕生 (195)	
二、両作品の「序」について (198)	
三、縮図とされた魯迅の「狂人日記」 (204)	
歴史作家の一考察	213
芥川龍之介と郁達夫	242
一、抒情とは何か (242)	
二、「情感」と「現実」 (246)	
三、描写と「真実」 (254)	

四、作風と芸術 (259)

『^{日本}漫遊 外人膝栗毛』についての一考察262

- 一、はじめに (262)
- 二、『外人膝栗毛』の外貌 (264)
- 三、魯文の『^{万国航海}西洋道中膝栗毛』との類似点 (269)
- 四、「外人膝栗毛」の特色 (277)
- 五、滑稽本の流れ (278)
- 六、まとめ (280)

魯迅の翻訳活動とその時代281

- 一、はじめに (281)
- 二、魯迅の日本文学訳書はどれか (282)
- 三、魯迅日本文学翻訳の時代 (285)
- 四、魯迅文学活動の開始 (289)
- 五、おわりに (297)

あとがき299

《杜子春》再考

关于《杜子春》的出处，日本学者山敷和早在《〈杜子春〉论考》^①中有过论述。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作出自于中国唐代郑还谷的《杜子春传》，这是不容置疑的。小笠美铃在《唐代传奇〈杜子春〉与芥川的〈杜子春〉》^②中也提到，《杜子春传》为唐代李复言所作，属于唐代传奇中“神怪类”的作品。宫城达郎也在他的《〈杜子春〉考》^③中说，这部《杜子春传》是唐代郑还谷所作的神仙小说，被收录在《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十二卷“晋唐小说”中，由盐谷温博士译注。另一位日本学者星川清孝在他的《〈杜子春〉传说的原型与类型》中这样写道：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唐代杜子春传的翻版。杜子春传（李复言或郑还谷作）——中略——是一部表达了母亲对孩子割舍不掉的爱和情的作品。^④

① [日]山敷和男：《〈杜子春〉论考》，载《汉文学研究》第九号，昭和36年9月版，第68页。

② [日]小笠美铃：《唐代传奇〈杜子春〉与芥川的〈杜子春〉》，《德岛大学国语科研究会》三卷三号，1978年3月版，第53页。

③ [日]宫城达郎：《〈杜子春〉考》，载《解释》第二卷十二号，昭和31年12月版，第6页。

④ [日]星川清孝：《〈杜子春〉传说的原型与类型》，载《解释》第三卷十号，昭和32年10月版，第2页。

此外，大冢繁树在《〈杜子春传〉与芥川〈杜子春〉的历史关联》^①中这样写道：关于李复言的《杜子春传》和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在历史方面的关联，我从比较文学的观点进行了考察，原文依据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和筑摩书房发行的《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二卷。然而，为了把《唐人小说》中的《杜子春》与芥川的《杜子春》加以区别，故在文中采用别名《杜子春传》，而将芥川的《杜子春》名称原封不动加以采用。另外，关于《杜子春传》的作者，虽有异议，暂可认为是李复言。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在日本研究近代文学的学者中似乎都如此认为：芥川的《杜子春》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唐代李复言或郑还谷《杜子春传》的带有虚构色彩的传奇童话小说。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取材于中国唐代小说，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原作究竟何人？这一问题仍说法不一，模棱两可。然而查明原作《杜子春》的出处和原作家，对研究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动机和意图，即为何在中国各种文学作品当中唯独选择了《杜子春传》来创作他的《杜子春》，意义十分重大，也有助于对他的作品和个人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为此，本文把中日两国的《杜子春》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以客观的资料为主，就《杜子春》的出处再一次进行考察和研究。

翻开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自然会想到中国的《杜子春传》（本文也为与芥川区别而暂用此名称）。的确，芥川的小说内容取材于中国的唐代小说。关于这一点，芥川本人曾在 1927 年 2 月 3 日给河西信三的信函中这样写道：虽然我“采用了唐代小说杜子春传中的主人公，但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故事是我自己创

① [日]大冢繁树：《〈杜子春传〉与芥川的〈杜子春〉在历史上的关联》，载《爱媛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六卷一号，昭和 35 年 12 月版，第 55 页。

作的”。

今村由美子在她的《〈杜子春〉与〈杜子春传〉》^①中这样写道：“就这部《杜子春传》而言，芥川表示他使用的是《五朝小说》和《唐人说荟》等明清时代发行的丛书（日本江戸时代以后广为流传），尽管这些丛书中记载的是郑还谷的《杜子春传》，但就作者，芥川却只字未提。”正因未提及作者，所以也就无法肯定《杜子春传》就一定出自于《五朝小说》或《唐人说荟》。这是因为唐书《古今说海》、《龙威秘书》、《大观》、《旧小说》、《方輿汇编·山川典》（卷七十四）、《寓简》（卷八十六引）等均可见到。关于《杜子春传》的作者问题，如上所述，日本从事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基本上都认为是中国唐朝李复言或郑还谷所作。其模棱两可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岁时广记》、《旧小说》、《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二四〇题）《云台峰道士》、《太平广记》中把《杜子春传》作为李复言《续玄怪录》的内容录入其中，也可能是因为《唐代丛书》索引中有“《杜子春传》……唐郑还谷撰”这样的记载。根据芥川藏书《太平广记》（卷第十六）《杜子春》篇末的记载“出《续玄怪录》”，查阅该藏书中的《唐代丛书》可以看到“《续玄怪录》……唐李复言撰”，由此人们会推断出《杜子春》系李复言所作。虽然《太平广记》未指明是李复言作，但是却有“出《续玄怪录》”作为“佐证”。另一种判断，依据芥川在1927年2月3日给河西信三信函中的“唐代小说杜子春传”这段话，于是查阅芥川藏书《唐代丛书》索引便得出了上述结论。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能确定《杜子春》的真正出处。那么，《杜子春》究竟出自谁手？问世于什么年代？这一问题已经

① [日]今村由美子：《〈杜子春〉与〈杜子春传〉》，载立教大学《日本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昭和52年7月版，第111页。